

#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态之维

## ——基于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的反思与展望

裴士军 徐朝旭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立足新时代提出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罗马俱乐部作为国际知名的学术团体,曾提出构建“世界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极为契合。基于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的反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能仅仅落实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层面的国际合作,立足生态层面的全球行动同样刻不容缓。人类应当树立生态思维,从传统物质主义的幸福观转向追求生态幸福的价值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世界观与价值观基础。此外,生态维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必将实现人际、国际乃至人与其他生命形式间共享、共赢与共荣的“生命共同体”的形成。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思维;生态幸福;生命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8)01—0007—07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立足新时代向全世界提出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呼吁,各国人民应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是以研究全球生态问题著称的国际民间学术团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发布了《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 1972)、《人类处于转折点》(*Mankind at the Turning Point*, 1974)等研究报告。基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罗马俱乐部从全球视野出发,对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进行深刻批判,主张各国应积极构建“世界共同体”。<sup>①</sup>以应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这与当前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极为契合。

放眼全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全球经济稳步发展,科学技术迅速进步,国际局势总体趋于缓和。然而,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生

态环境却随着社会进步而遭到急剧破坏。“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已成为困扰全世界的难题。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提出,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做出努力,通过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绿色低碳等方式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具体实践中,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建设,组织召开G20峰会与金砖五国会议,制度上的顶层设计与具体有力的措施双管齐下,提出解决世界难题的“中国方案”。时至今日,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基础。在日趋严重的全球生态困境面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能仅仅落实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层面的国际合作,立足生态层面的全球行动同样刻不容缓。全人类应当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了共同且唯一的生存家园,积极行动,最终实现共赢、共享与共荣。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道德相对主义批判”(项目编号:16YJA71002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裴士军,男,厦门大学哲学系伦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研究。

徐朝旭,男,哲学博士,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研究。

<sup>①</sup> 梅萨罗维克·佩斯特尔《人类处于转折点——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梅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196页。

## 一、新时代任务: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从人类历史出发,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断构建“共同体”的历程。共同体的形成,源于个体共同的情感、共同的信仰以及对于共同体本身的认同。合作共生是共同体得以发展和延续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描述为由“天然的共同体”转化为“虚幻的共同体”,进而再发展为“真正的共同体”的过程。原始时期的人类社会基于家庭血缘关系自然地形成了“天然的共同体”,但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突破家庭血缘的局限,到了文明时代,“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sup>①</sup>一方面,人们有共同的基本需要,所以需要共同劳动来予以满足;另一方面,个体之间具有差异性,“人们有不同的需要,需要分工和交换来予以满足”<sup>②</sup>。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个人联合而成的是“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此时的“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的共同性”<sup>③</sup>。“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sup>④</sup>真正的共同体应当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体联合而成的共同体。而若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走出生态困境,是实现“真正的共同体”的必经之路。生态环境是“真正的共同体”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生态环境在人类的生存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正是处于各个阶段的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不同认知,形成了特定的“共同体”模式。原始时期,人类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在与自然的交互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所以个体联合起来共同抗衡自然力量、自然灾害,形成了“天然的共同体”。而工业革命以来,不仅存在前文所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统

治,更充斥着人类对自然的压榨奴役。生态环境与人类同处“共同体”之中,但人类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欲望导致“真正的共同体”构建只能沦为虚幻。随着生态危机的爆发,人类社会的发展陷入困境,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变得遥遥无期,这恰恰是恩格斯所言“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生态问题是当今时代的大问题,关乎人类自身的生死存亡。罗马俱乐部的最新研究报告《2052: 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2052: A Global Forecast for the Next Forty Years,以下简称《2052》)预测,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将是未来社会的重要问题。“科学家对人类每年免费得到的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估算,其数值和全球GDP总量是一个数量级的。”<sup>⑤</sup>全球生态危机大爆发的背景下,污染无所不在,个体无处可逃,人类社会的明天受到巨大威胁。面对生态危机带来的生存困境,人类应当认识到个体命运紧密相连,人类与生态环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人类社会要走出生态困境,提出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历史潮流且唯一正确的选择。

最后,进入历史新时代,新的时代环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当前物质生活条件、科学技术水平已取得巨大进步,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可能。发达的互联网技术、便捷的交通设施,加快推进全球化进程。《2052》研究报告指出,未来世界中,电子通讯不断普及,所有信息都能够转换成数据。人类的一切行动都能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录下来。“用数字形式传递信息,在操作成本和实行的可靠性方面也有重大的优点。因为不管是声音、视象还是数据,所有的信息都表现为一连串的二进制数。”<sup>⑥</sup>由此,信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地交换、传递、流通乃至共享。伴随信息全球化、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永不掉线的互联网将对大多数社会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sup>⑦</sup>,微电子学、互联网乃至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将重新塑造世界。现代科技的发展让人与人之间不再陌生,距离不再疏远,联系更为紧密,这为构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

② 曹刚《论共同善》,《伦理学研究》2016年第5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1页。

⑤ 兰德斯《2052: 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秦雪征、谭静、叶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240-241页。

⑥ 弗里德里奇·亚当·沙夫《微电子学与社会》,李宝恒译,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6年,第38页。

⑦ 兰德斯《2052: 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第206页。

“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有力的物质条件基础。

## 二、生态思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基础

毋庸置疑,人类生存离不开生态环境。人们应树立生态世界观,具备生态思维,从生态学角度来把握世界的总体联系和发展的本质规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牢固的世界观基础。生态思维,不仅关涉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考量,还是强调以一种系统视角来看待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思维方式。“所有的自然物都与自然中的其他自然物处于复杂的相互联系之中,所以生态学告诉我们,你在自然中永远都不可能只做一件事情,即你做的任何一件事都必然会引起其他事物的改变。”<sup>①</sup>由此可见,“生态”概念已不仅仅只是指自然环境、生物圈的名词,同时,这一概念可以作为一个方法论范畴,意指一种强调系统性的哲学思维方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应重新认识自然,抛弃二元对立的自然观,协调处理人与自然的的关系问题。罗马俱乐部的早期研究报告《人类处于转折点》指出,“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存,都有赖于生态系统的稳定。”<sup>②</sup>这是全人类可以达成的基本共识。美国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III)在《哲学走向荒野》(Philosophy Gone Wild, 1989)中详细论述道“个体或物种都不能光是自己存活;它们所处的系统也得存活。每一生物体或物种都与其他生物体或物种有一种敌对,但这样具有自己价值的每一个生物体或物种又都依附于一个整体,在其中与别的个体与物种交换价值,结果是使价值得以保存。”<sup>③</sup>同时,还应注意,生态环境一方面孕育、给予了人类以生命,但另一方面,对于人类而言,她也可以是冷漠的,甚至是狂野的。如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指出,“自然往往是通过那些使我们满足的东西而冷酷、残忍、无情地毁灭我们的。恰恰是那些自然借以毁灭我们的危险,才使我们联合起来创造了文明社

会,文明社会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旨在使我们的共同生活成为可能。文明的主要任务,它实际存在的理由在于保护我们免遭自然之害。”<sup>④</sup>因此,生态环境对于人类而言,是一个矛盾存在。但无论如何,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寓于共同体之中,两者是矛盾统一的,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作为其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在著作集《生地法则》中指出,人类历史需要从“二人游戏”进入到“三人游戏”状态。“二人游戏”中,“一边是人,另一边作为反对派的还是人。……世界依然是被我们陈旧政策排除出局的第三者”<sup>⑤</sup>。而“三人游戏”中,“地球是其中不折不扣的主体。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过去处于被动位置的客体成为了主动方。……过去游戏的主体——人类,如今开始依赖在过去还需依靠他的事物”<sup>⑥</sup>。由此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具备生态思维。人类命运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全人类共同幸福的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最终会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具备的生态思维,还蕴含着以一种系统视角来看待人类社会遇到的问题思维方式。孤立地解决生态危机的企图,“已经证明不仅是短命的,而且会损害其他方面……真正解决问题的各种措施之间显然是相互依赖的。”<sup>⑦</sup>生态危机,这样一种全球性问题“已向人类提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挑战,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能够单独应付这些挑战。”<sup>⑧</sup>罗马俱乐部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告诫并呼吁,应以注重系统发展、强调全球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来应对生态危机。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将研究视野扩大到世界整体的范围,探讨全球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之间互相牵制的极限问题。《人类处于转折点》则指出,世界是一个整体,全球

① 卢风《非物质经济、文化与生态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2-43页。

② 梅萨罗维克·佩斯特《人类处于转折点——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梅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11-12页。

③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III:《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7页。

④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一个幻觉的未来》,杨韶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87-88页。

⑤ 米歇尔·塞尔《生地法则》,邢杰、谭弈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42页。

⑥ 米歇尔·塞尔《生地法则》,第43页。

⑦ 梅萨罗维克·佩斯特《人类处于转折点——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第1页。

⑧ 奥雷利奥·佩西《未来的一百页——罗马俱乐部总裁的报告》,汪幅君译,王恩光校,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第122-123页。

合作是应对各种危机的有效办法。“合作是各方所能走的唯一合理和最有益处的道路。如果有一方企图大占另一方的便宜,就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它将损害所有各方的利益。”<sup>①</sup>《未来的一百页》(One Hundred Pages for the Future, 1981)中,罗马俱乐部创建人奥雷里奥·佩西写道“如果世界只有一个,它的命运也只有一个:人类大家庭只有一个命运,整个人类只有一个命运……我们不仅要关心本国的未来(这是显而易见的),也要关心其他国家的未来,不论别的国家同我们有什么分歧,但大家毕竟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命运。”<sup>②</sup>在应对具体问题时,该报告指出发展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发展,应“将经济问题与生态问题联系在一起,将安全问题与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将能源危机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系在一起,把地球这一角落发生的事件与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联系在一起。”<sup>③</sup>《学无止境》(No Limits to Learning: Bridging the Human Gap: The Report to the Club of Rome, 1979)则指出了国际社会中国家个体与世界整体的辩证关系,“全球的相互依赖不应当忽视自主,自力更生也不应当忽视全球的整体性。”<sup>④</sup>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具备的生态思维,不仅要拥有空间维度的全球意识,还要立足时间维度,考虑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共同利益。国内学者甘绍平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sup>⑤</sup>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生态危机的爆发与人们盲目追求眼前利益密切相关。《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使用有效的数据和简单的逻辑,对工业社会的短视进行了一次直接的攻击。盲目追求眼前的增长注定要使社会从自然界和人类两方面达到极限,从而引起灾难性的冲击。《人类处于转折点》研究报告深刻剖析人类自身存有的问题,“人类有一种倾向,总是为了眼前需要而寻求短期利益,甚至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再者,如果人们把一种令人满意的短期现象错误地当作了

长期现象,也会导致严重的后果。”<sup>⑥</sup>如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认为石油能源“有的是而且很丰富……被当做是永久和不会改变的状态”<sup>⑦</sup>。这样的认识实为荒谬,因此,石油能源危机必然发生。该报告还指出,“我们的世界并非发达世界;我们的世界实际上是过度发达的世界。……在地球上的人类生活中,人类第一次被要求进行自我克制不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人类被要求节制不要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继续推进,或者至少将其引导到不同于从前的方向上去;地球上所有未来的世代代子孙要求今天的人类与贫穷不幸的人们共享自己的财富——不出于慈悲而是出于必要。”<sup>⑧</sup>佩西在《人类的素质》(The Human Quality, 1977)中引用丹尼斯·盖伯的话,“人类虽然不能预测未来,但可以创造未来。”<sup>⑨</sup>他警示人们必须停止“盲目进入未来”,而应该开始“创造”未来。他强调,“人类必须尽可能看得远一点,必须及时同等地重视现在和将来,因为人类的行动可能会影响现在和将来。所以人类必须决定他愿意得到什么样的未来,并且根据未来去规定自己的行动。”<sup>⑩</sup>当前科技迅猛发展,人类已然获得了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决定性力量,而人类的未来基本上就取决于如何运用这种力量。因此,为了未来的幸福——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共同生存家园,人类必须杜绝盲目短视,而应以系统发展的思维方式来谋求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罗马俱乐部的诸多研究报告的反思,面对纷繁复杂的诸多世界性难题,人口危机、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相互交织在一起,恰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所说,人类能否打造出一把精巧的、具有多功能的“瑞士军刀”来解决问题,是当今世界的重大任务。其中,全人类树立生态思维是最基本的要求。进而,提出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治理这些世界难题的基本架构与模式,则是在思想层面上打造这样一把

① 梅萨罗维克、佩斯特《人类处于转折点——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第97页。

② 奥雷里奥·佩西《未来的一百页——罗马俱乐部总裁的报告》,第10-11页。

③ 奥雷里奥·佩西《未来的一百页——罗马俱乐部总裁的报告》,第111页。

④ 詹姆斯·博特金、马迪·埃尔曼杰拉、米尔恰·马利察《回答未来的挑战——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学无止境〉》,林均译,陶祖骥、秦麟征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5页。

⑤ 甘绍平《寻求共同的绿色价值》,《哲学动态》2017年第3期。

⑥ 梅萨罗维克、佩斯特《人类处于转折点——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第84-85页。

⑦ 梅萨罗维克、佩斯特《人类处于转折点——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第84-85页。

⑧ 梅萨罗维克、佩斯特《人类处于转折点——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第136页。

⑨ 奥雷里奥·佩西《人类的素质》,薛荣久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151页。

⑩ 奥雷里奥·佩西《人类的素质》,第151页。

“瑞士军刀”的第一步。

### 三、生态幸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历史层面上的天然共同体,它不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地域环境的基础上,恰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1983)中指出的“民族”概念,“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即它不是许多客观社会现实的集合,而是一种被想象的造物”。但这样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非是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这样一种“社会事实”,它的形成建基于共同体成员共同的价值观之上。共同体成员主体要从“民族”扩大到“种族”,扩大到“全人类”,必须要认识到的是人类共同拥有一个地球,地球生态系统关乎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在地球生态系统面前,人类共享同样的命运。只有全人类秉持共同的生态价值观,这样一种共识能够成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纽带,成为构建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才能真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的成员应拥有共同一致的价值观信仰。当今时代,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带来了更多的思想阻碍。《2052》研究报告指出,从现在开始,全球共识的达成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过去,只有一份(最多几份)国家性的报纸确定讨论的议题;而我们现在有数不胜数的博客。过去,只有几家国家电台(可能只有一台);现在,我们有数百家本地电台,为不同的需求服务。之前,我们只有几部百科全书;现在,我们有不断更新的维基百科和许多类似的百科全书。形成一个大多数人都持有的观点变得十分耗时。”<sup>①</sup>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需求体系”一节中指出“我们的需求和欲望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所塑造的,而这个社会又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sup>②</sup>科技发展顺应历史大势,社会不断地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人类个体的生活需求与欲望也将随科技发展、社会演进而转变。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主流、边缘文化冲击交汇,价值趋向多元化,个体需求多样化。然而,尽管全人类要在所有方面

达成共识很难实现,但应注意到,人类在历史进程之中,无论是个体之人还是国家集体,无不追求着幸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幸福,而这与地球上各种肤色、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每个人的生活追求是一致的。当前人类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并未带给人类真正的幸福,伴随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的精神生活却并未随之提升。相反,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的精神压力越来越重,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自杀率越来越高。同时,人类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因大气污染、水污染导致肺癌、肝癌等癌症高发,癌症从一个稀有名词成为了一种常见的话题。由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幸福生活的前提条件,真正的幸福生活应当是“生态幸福”的生活。

生态幸福应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每个成员的价值观信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也就是一种幸福生活。什么是幸福,这就是一个涉及价值观的问题。提倡人们应树立生态幸福观,并非批判现实生活中人们认为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没有价值。任何人都明白,人都不可能脱离生态环境而独立生存,人本身就寓于生态环境之中。生态幸福,不同于物质主义、经济主义乃至消费主义的幸福观,主张“努力赚钱、及时消费”是生命的意义,其强调的是“根据生态学反对以无限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至于该如何以其他方式追求人生意义,从而让回答方式向无限敞开,让人生的意义追求向无限敞开”<sup>③</sup>。每个人不可能像梭罗、颜回那样都追求一种物质极简的朴素生活。立足全球,人被抛于世界之中,个体之间既有共性,又有着差异。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身高、体重,但他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共性,就是求生欲。求生欲比较容易满足,吃饱喝足穿暖足矣,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问题。由此,实现人的幸福生活就成为了另一个新的基本欲望。现代工业文明主导的幸福观是这样一种物质主义、经济主义乃至消费主义至上的幸福观,强调生命的意义在于物质占有、物质享受,从而号召人们“积极参与争强斗富”;大力倡导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却导致过量的市场需求,严重破坏了

① 兰德斯《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秦雪征、谭静、叶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167页。

② 彼得·辛格《黑格尔》,张卜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35页。

③ 卢风《非物质经济、文化与生态文明》,第69页。

生态平衡,最终陷入大量消耗、大量生产、大量浪费的恶性循环,这也是酿成生态危机的原因。

当然,生态幸福价值观并非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全面否定,而是力求在其基础上向价值追求多样化、精神化趋势不断提升。我们当然要承认,现代工业文明确实带给人类社会翻天覆地的进步,经济快速发展,生活舒适便捷。学者卢风在著作《非物质经济、文化与生态文明》中指出“我们当然不应否认经济在文明中的基础性地位,但基础性的未必是最重要的。人必须吃才能活着,但人活着并非只为了吃;人必须生产足够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活着,但人活着并非只为了生产、占有和消费物质财富,有远比物质财富更值得创造和追求的东西。”<sup>①</sup>未来社会中,诸多机械性的生产劳动将被人工智能所淘汰。国内部分城市已经有“无人超市”开始运营,尽管刚起步,但未来势必以这种趋势继续发展。李开复也在公开演讲中指出,“未来十年翻译、简单的新闻报道、保安、销售、客服等领域的人,将约有90%会被人工智能全部或部分取代。……人工智能是非常理智的,记忆力非常好,但他们真的不懂什么是美,什么是幽默,它不懂为什么毕加索是伟大的艺术家,它也不懂为什么周杰伦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家。”<sup>②</sup>因此,机械性的生产劳动被人工智能取代后,未来人类就要投入到更能体现个性的思想层面的劳动创造。人们原本体现人生价值的物质生活方式会越来越相似,而能够凸显个性的生活方式只能从精神层面来展现。法国当代哲学家吉勒·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在著作《轻文明》中指出,“如果说全世界的生活方式越来越相似,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爱好却不是这样,由于集体约束力的削弱以及生活方式和生活选择的增多,它们反而变得更多样化。……世界各地都在贩卖相同的电脑,但这些电脑的买家却具有越来越多的标准、生活经历、期望和行为。”<sup>③</sup>所以在未来社会,人们的需求会逐渐趋向多样化、精神化,由对同一的物质财富的偏好转向对能够体现个性的文化价值的偏好。正如梭罗著成《瓦尔登湖》一书并非要求所有人都像他那样生活在瓦尔登湖畔,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找

到自己喜欢且独特的生活方式,他写道“我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有尽量多的不同的人;我希望每一个人都非常谨慎地找到并追随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他父亲的或母亲的或邻居的生活方式。”<sup>④</sup>人们追求幸福生活无可厚非,但应追求一种合乎“生态”的幸福,“幸福生活不仅包括物质上的幸福,更应该包括精神上的幸福”<sup>⑤</sup>逐渐从传统物质主义的幸福观转向生态幸福观。生态幸福观,“不仅提倡回归注重生活质量的生活方式,而且将亲近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看成是幸福生活的样式”<sup>⑥</sup>。这样一种幸福观若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共识,那么,这就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夯实的价值观基础。

#### 四、生命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维度透视

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回应当前“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生态建设维度透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一共同体的理想成果就是一个将种际、人际与国际三个层面都包含在内的“生命共同体”。因为在这个地球家园中,不仅存在着人类,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等。不仅人类个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的物种命运同样密切相关,它们的生死存亡同样关涉人类未来的命运。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将其他自然物种纳入到道德考虑的范围,“在种际层面实现人与其他生命形式的共同繁荣”<sup>⑦</sup>,最终意味着必将实现“生命共同体”的形成。

西方当代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认为,人是具有伦理品质的存在者,人除了“趋乐避苦”的生物属性,还具备“去恶向善”的社会属性,人们应该过一种伦理的生活。“人的生物性并不能主宰我们非要一狭隘的心态做出自私自利的终极抉择不可。相反地,我们所走的演化之路,已经把我们带上了一个不只会关心自己的子女、亲戚,甚至

① 卢风《非物质经济、文化与生态文明》,第102页。

② 李开复《未来很多工作将被人工智能取代》,http://fashion.sohu.com/20170227/n481885149.shtml 2017年2月27日。

③ 吉勒·利波维茨基《轻文明》,郁梦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37页。

④ 梭罗《瓦尔登湖》,王家湘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70页。

⑤ 裴士军、徐朝旭《梭罗的极简主义生活智慧及其启示——基于生态幸福观的视角》,《鄱阳湖学刊》2017年第3期。

⑥ 徐朝旭《生态幸福视域下的发展理念创新》,《东南学术》2016年第6期。

⑦ 徐朝旭《生态幸福视域下的发展理念创新》。

包括了更大群体的方向。”<sup>①</sup>彼得·辛格之后,有一大批伦理学家积极倡导“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思想,从动物权利论,到以敬畏生命、尊重自然为主旨的生物中心论,再到以深层生态学以及自然价值论为代表的生态中心论,这些道德理论无不彰显着道德共同体不断地从人类自身扩大到动物、植物,乃至整个生态圈。彼得·温茨(Peter Wenz)提出了一种“同心圆”观点,“人们对其近亲比对同事负有更多的义务,对一起工作的同事比不在一起工作的同事负有更多的义务,对自己社会中的成员比其他社会的成员负有更多的义务。……一般来说,在最靠近的圆中的人相对较少,居于其后的圆中将会有更多的人,诸如此类。我对某人的义务随着此人

所在的圆与我的接近程度而增加。在某个特定的圆中的存在,大抵与家庭关系、个人友谊、就业、种族地位和物理环境等特征相关联。”<sup>②</sup>人类理应对自己的同类、近亲负有更多的义务,这符合人的本性。但这不意味人类就可以将那些处于稍远距离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弃之不顾,这些事物也处于同心圆之中,属于“生命共同体”中的存在物。在东方文化中,“仁爱”是核心精神。“仁爱”精神不仅仅“爱人”,而且还包括“爱物”,孟子有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sup>③</sup>。在此,其同样蕴含着构建“生命共同体”的维度。弘扬“仁爱”精神,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走向共享、共赢与共荣的“生命共同体”,这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发展。

[责任编辑:谢雨佟]

(上接第6页)

第二,从“现实的人”出发,就可以看到,在制度形成与变革时,人有主动性、创造性,但不是任意创造,它受到所面临的挑战、资源限制、制度能力限制、价值观等多重限制。如果看不到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就会把制度演进过程理解为一个类似自然规律的过程,进而把现存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现状都理解为合理的,这样,对制度的认识变成了对制度的辩护。同时,如果看不到实践者所受到的各种限制,就会夸大人的创造性,把制度理解为是按照人的主观需要设计的,或者,在社会落实某种理想社会模型,这样,就会把挑战、资源限制、制度能力限制等多方面复杂的客观因素归结为历史人物的个人原因,比如性格、道德、社会理想等,苛求历史人物。

第三,“价值”是制度产生、变革中的要素之一,任何制度都不可避免地体现着某种价值观、某种理想社会的想象。因此,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在制度变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制度是在挑战、资源、制度能力、价值四个要素相互作用中产生的,价值观念影响着制度的内在逻辑,不存在离开价值纯粹客观的制度的内在逻辑。如前所述,统购统销制度在解决粮食收购危机中形成,并推动计划经济体制迅速形成。但这只是对于要搞工业化,以实现社会

主义为目标的共产党人来说的,换成另外一个政党,有着完全不同的阶级基础,不同的发展目标和价值体系,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能产生。

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体系都是维护这个社会的既存制度和秩序的,把其理解为天然合理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源的约束被打破,新的制度的可能性已经出现,但旧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会制约人们对新社会制度的想象力。就此而言,对某种制度进行价值观批判是非常重要的,是超越某种制度的第一步。但是,不能由此夸大价值评价,认为制度是某种价值观在社会中的具体化,比如,认为西方社会制度之所以发展是因为它是符合“人性”,因为它符合“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不能把对制度的认识变成单一的价值评价。

第四,从“现实的人”出发,正确评价制度成本和历史人物的作用。社会实践者在解决面临的挑战时,要受到制度能力(制度结构)和有限资源的制约,即使在打破旧制度,提高制度动员资源能力的时候,也是受到各种制约,其新政策、新制度在解决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时,都存在一定的弊端。但是,只要能够解决问题,而且利大于弊,这个新政策、新制度就是成功的。

[责任编辑:谢雨佟]

① 彼得·辛格《生命,如何作答——利己年代的伦理》,周家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0页。

② 彼得·温茨《环境正义》,朱丹琼、宋玉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03-404页。

③ 史次耘《孟子今注今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398页。

## Abstracts of Main Papers

### **“Real Human Existence”: Original Point from the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 to Escape the Trap of Western Discourse** ..... LIANG Xiao( 1)

There is a western discourse trap in the research of the development road and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ure of China ,that is: applying the Western value system ,institutional model and development road to criticize against the Chinese one ,and even projecting China’s future based on this theory. Institution originates from practice ,including four elements: challenge ,resources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nd value system. The social practitioners are real human existence ,who have to deal with emergent problems with limited resources ,confined by Institutional capacities and the value system and seek reform. The Western discourse trap originates from an epistemological error that separate the social practitioners from real existence as abstract human beings ,and se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s an inevitable natural process or as a subjective design. This theory can’t fully understand the true process of the real history and the society both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n China. The real human existence is the l original Point from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 to escape the Western discourse “trap”.

###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Reflection and Forecast on Research Reports of the Club of Rome** ..... PEI Shi – jun & XU Chao – xu( 7)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a new concept put forward recently ,is based on new era situations. As a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academic group ,the Club of Rome has proposed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world” ,which is closely relevant to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f many research reports of the Club of Rome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community should includ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ot only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and security ,but also the global action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e should establish an ecological thinking ,and take a systematic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Meanwhile ,we should pursue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happiness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materialistic one.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will definitely achieve the “community of life”. It is a community that will reach the goal of sharing ,all – win and co – prosperity among people ,nations and even between mankind with other forms of life.

### **Legal Reflection and System Reconstruction of the Procedures of Collective Land Expropriation**

..... GAO Fei( 34)

Abstract: As the procedures of collective land expropriation in China is not standardized ,the procedures of expropriation decisions thus lack transparency ,and the rights of the expropriated people is not well protected ,and the relief channels is not in place ,therefore ,in practice ,it is quite often that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abuse their expropriation power. To trace back the origin of institutional defects in the procedure of land expropriation ,the reason lies in the historical continuation of emphasizing on substantive law and ignoring the process ,the dominant value of emphasizing on efficiency and ignoring fairness ,the concept of emphasizing on power and ignoring rights. At present ,we should seriously review the history of emphasizing on substantive law and ignoring the process ,take corrective actions in this regard ,reverse the dominant value of emphasizing on efficiency and ignoring fairness ,and replace the legal concept of emphasizing on power and ignoring rights with the legal concept of balancing between power and right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improve the approval procedures for the convers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to construction land ,establish the pre – approval procedures for collective land expropriation ,refine the procedures for the expropriation decision ,and improve the procedures of land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and the resettlement plan determination. As a result ,we can control the power and guarantee the rights by the procedure ,thus ensuring that the legal system of collective land expropriation can run smoothly.

### **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in Chinese Enterprises’ Overseas Investment**

..... HOU Lin & ZHOU Jin( 64)

In the face of the “new normal” of the economy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but also feasible for Chinese companies to “go out”. For China to expand foreign investment to improve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and soft power ,it is a nessecity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inherent Chinese culture symbols covering the mainstream values connotation ,